

项英传

● 王辅一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项英传

王辅一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项英传/王辅一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0

ISBN 7-80023-910-1

I. 项… II. 王… III. 项英-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6210 号

项 英 传

王 辅 一 著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2581570 传真:(010)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6.375 印张 420 千字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023-910-1/K · 834

定 价:20.00 元



抗日战争初期的项英

项英同志
浩气长存

杨尚昆同志为项英铜像题字。
一九九〇年一月，时任国家主席



项英(右)、陈毅(左)、陈丕显(中)合影(1939年)

前　　言

项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担任过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等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

然而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的功绩多被抹煞，在“文革”中被扣上“大叛徒”等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被说得一无是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党史资料的披露，学术界对项英功过的评述逐步有了改变。目前，尽管某些小说和文章还在贬抑项英，但肯定项英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占主导地位。

鉴于对项英的看法有争议的实际情况，笔者在研究项英和撰写《项英传》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史料为依据。十多年来，我查阅到直接或间接与项英有关的史料达数千万字。我特别珍惜皖南事变前形成与项英有关的史料，包括当时的文件、电报、会议记录，项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皖南事变后形成的各种史料，我注意到当时形成的历史背景，注意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并不机械地照抄照搬。

大量的史料表明，项英对人民解放事业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他长期在白色恐怖情况下，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为工人的翻身解放进行了坚决斗争，参与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1927年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中央苏区战斗的几年，为工农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壮大作出了贡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和陈毅等艰苦卓绝地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在抗日战争中，他和叶挺、陈毅等一起，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些，都是有史为证的。

研究与项英有关的史料，他的许多优良品质和作风会很自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第一，坚定的革命信念。项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碰到许多艰难曲折，然而他不灰心丧气，总是满怀信心地前进。他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极其艰苦的岁月中，长年在深山野林里和敌人浴血奋战，但仍然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书籍带在身边，有空时就读一读，从中吸取力量。第二，无私的奉献精神。项英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办事，不空说漂亮话，忠心耿耿地为革命日夜操劳。他严于律己，密切联系群众，和指战员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第三，实事求是的、正派的作风。项英秉性耿直，刚正不阿，遇有不同意见，敢于坦诚地向组织上反映。1930年，他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武汉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使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所要求的武汉暴动没能举行起到一定作用。1939年，他得知蓝苹（江青）在上海时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不良表现，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项英上述优良品质和作风，都是难能可贵，值得珍视、学习和发扬的。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项英自然也不是足赤之金，他在革命过程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执

行过“左”的错误路线，提出过“左”的口号，指挥过红军力不胜任的战斗。在抗日战争中，他对华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对向北发展的自觉性不够，措施不够有力，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不够，对合法的手续、方式考虑多了，对自主的发展强调不够，结果使一些部队和地区受约束多，影响到活动和发展；特别是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对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应迅速撤至江北指示的执行迟迟下不了决心，使转移丧失有利时机，加之在转移途中处置失当，因而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但是，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项英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①。笔者认为，这一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适用于评价项英的一生。

项英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在革命征途中功大于过，他创立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1
一 贫寒家庭	1
二 学徒生涯	2
三 办工人俱乐部	4
四 入党前后	11
第二章 投身工人运动	16
一 发展武汉工会	16
二 推动铁路工运	21
三 在二七大罢工中	26
四 沪西二月罢工	38
五 转战上海、武汉	46
六 参加“六大”前后	56
七 全总领导岗位	66
八 准备武汉暴动	78
第三章 在中央苏区	89
一 奉命进入中央苏区	89
二 正确对待富田事变	96
三 “一苏大”召开前后	108
四 为扩大苏区出力	118
五 加强人民政权和苏区的建设	130
六 在军委领导岗位上	144

DK51/64

七 “二苏大”召开前后	159
第四章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67
一 掩护主力转移	167
二 转变斗争方式	179
三 突出重围	186
四 分兵游击	196
五 反“清剿”	203
六 巩固内部	218
七 游击新特点	228
八 新的考验	236
九 实行谈判改编	252
十 同党中央恢复联系	267
十一 向党中央汇报	276
第五章 战斗在新四军	286
一 党中央决策过程	286
二 编组前后	295
三 向敌后挺进	305
四 坚持皖南抗战阵地	320
五 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327
六 到苏南敌后巡视	339
七 发展方针的实践者	346
八 加强政治领导	359
九 治军抓重点	372
十 发扬优良传统	382
十一 外援的积极争取者	391
十二 项、叶之间	401
十三 东南地区党的工作	411
第六章 在皖南事变中	425
一 局势的逆转	425

二	北移的变化	429
三	北移路线的波折	441
四	北移的准备	448
五	北移途中	457
六	最后两个月	469
七	沉痛的教训	480
八	仓促的决定	493
九	殉难之后	503
	后记	512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一 贫寒家庭

项英，原名项德隆，又作德龙、飞龙，化名江钧、张成、韩应、江俊，笔名夏英，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一个职员的家庭里。

项德隆的祖籍是武昌县舒安乡项家村。祖父因会种花、植盆景，就由乡下搬到武昌城涵三宫落户，以种植花卉为业，当地人曾称他家是“项家花园”。父亲项天卫是县里管理钱粮簿册的职员，为人忠厚老实。母亲夏氏，善良好能干。项德隆有二兄一妹，自己排行老三。

项德隆七岁那年，开始进入武昌育才小学读书。他聪明伶俐，学习刻苦，作业认真，还很注意练习小楷毛笔字。几年后，当他看到父亲忙得不可开交时，就经常利用课外和晚上时间，帮助父亲誊抄钱粮簿册。这就减轻了他父亲的劳动负担，很得他父亲的欢心。由于那时常写常练，使他逐步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行书字。同时从这早期的劳动实践中，学到了办事要认真仔细、一丝不苟。

项德隆十二岁那年，小学毕业，父亲不幸早亡，家境迅速恶化，仅靠母亲纺织、刺绣和帮人洗衣等所得的微薄收入来糊口。他为了帮助家庭维持生活，不得不放弃读书，寻找职业，先是想进商店当学徒，后又想进工厂当学徒，但三年却找不到工作。

家庭的困难生活，恶人的作威作福，善良劳苦大众累死饿死的悲惨遭遇，所有这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给少年的项德隆思想上以很大的刺激，也促使他早熟。

当时，项德隆的叔父项仰之任武昌慈善会会长，有钱有势。但项德隆很有骨气，人穷志不短，不和他叔父家来往。

有一天，项德隆的亲友看他家的日子过得艰难，劝他找项仰之求情，给些帮助。这也是好意。而坚强的项德隆却宁肯饿肚子，也不愿意去找项仰之求情。他联系到叔父的日常为人，对劝他的亲友说，项仰之是个吃人的恶棍，欺压老百姓的魔王，不能和这种人打交道。

项德隆这段话，项仰之听说后很是恼火，骂项德隆是个“不孝之子”。

项德隆却理直气壮地对人们说：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欺压人民的人，不仅不能孝，而且还要打倒他们。

这表明，年少的项德隆对旧社会、对有钱有势人家的仇恨之心是很深的。

1911年，也就是项德隆十三岁那年，爆发了辛亥革命。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发动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1912年元旦，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这场革命，给项德隆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个人只不过是剪掉了一条辫子，但“革命”二字的观念对他却是有一定影响的。

少年时期的项德隆，给他的乡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和他同桌读书三年的黄凤梧老人，在七十年后回忆项德隆少年的情景时，形容他是：“读书很聪明，外表文秀，内怀大志。”^①

二 学徒生涯

1913年，已经十五岁的项德隆费了很大周折，才考入武昌城

^① 中共武昌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武昌党史资料》第6期，1984年9月26日。

模范大工厂(纺织厂)当学徒。当时,学徒收入十分微薄,生活很苦,还经常挨打受虐待,受到不少折磨。项德隆为了生活,只好将苦水暂时吞咽下去。三年满师后,他年已十八岁,留在厂里当工人。

这时,项德隆的妹妹项德芬也成为一名纱厂工人。后来,项德芬在项德隆的影响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工人运动中去。

1917年冬,项德隆从《汉口新闻报》上得知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受到很大的鼓舞。他联系自己和工友们身受中外资本家盘剥和工头欺凌的情景,心想:俄国工人阶级能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工人阶级也应该和能够起来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从此,他心中便开始向往着革命了。

1919年5月初,报纸上刊登消息,披露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向日本索回胶州湾权利的要求遭到拒绝的情景。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高举“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字样的旗帜,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全国各地工人和各界人士深表同情,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这对项德隆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当年,董必武、陈潭秋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武汉办起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项德隆在这所工人夜校学习,提高了革命觉悟,开始懂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开始懂得工人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本原因,较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明白了工人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改善生活待遇,就要靠自己团结起来去争取。他决心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出力,参加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斗争。

从那时起,项德隆便在自己所在的模范大工厂中,自发地从事工人运动。开始,他只在少数工人中秘密活动,后来逐步扩大到几十个人。

1920年4月,项德隆利用本厂工人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选择有利时机,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当时,棉布在市

场上畅销。工人们的罢工停产，直接影响到资本家的利益。停产愈久，影响就会愈大。资本家对工人的罢工感到震惊，怕罢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事态进一步扩大，影响生意，被迫很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给工人赔礼道歉，将工人痛恨的工头开除出厂，并给工人增加了工资，还答应要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项德隆领导的模范大工厂工人的罢工要求得到了满足，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武汉纺织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它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工头再不敢随意打骂工人了。

这次罢工的胜利，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工头的压迫是一次沉重打击。它使工人们扬眉吐气，激励起反抗剥削、压迫的热情，看到了工人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纷纷参加工会。于是，在项德隆的领导下，模范大工厂迅速组织起全厂性的工会。

项德隆第一次领导罢工斗争的胜利尝试，使他大大提高了开展工人运动的信心，增强了同资本家作斗争的勇气。

三 办工人俱乐部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它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强调党要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合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①根据“一大”决议的精神，中共中央于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部机关，并出版了指导工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①。

同年10月，出席中共“一大”代表、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包惠僧返回武汉，奉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不久改为武汉分部），并兼分部主任，以便在武汉地区开展劳动组合的工作。同时，在武昌察院坡的时中书店，建立《劳动周刊》武汉发行处，以广泛宣传劳动组合的主张。项德隆作为《劳动周刊》的热情读者，时常到那里去阅读进步书刊，增长了知识。

同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影响到京汉铁路（按：新中国建立前曾称平汉铁路）工人，他们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江岸铁路机车工人还要求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派人去领导他们。为了推动江岸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包惠僧和李汉俊（上海党组织成员，此时来汉口任市政府督办公署总工程师）、陈潭秋（武汉党组织成员）等商量，确定尽快派人组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他们经过物色，但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就在包惠僧着急的时候，项德隆写去了信，说他从《劳动周刊》上得到消息，希望参加工会工作，并要求当面谈谈。这使包惠僧喜出望外，于是立即复信，约项德隆在本星期天下午一点到武昌黄土坡十六号寓所面谈。项如约按时前往，两人热情交谈起来。

通过这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包惠僧对项德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他很不平凡，有思想，有抱负，特别对工人运动表现出很高的热情，非常高兴^②，心想：如果各厂的工人都和项德隆一样，那工作就好做了。临别前，包惠僧送给项德隆新出版的《两个工人谈话》等小册子，并约他下一个星期天下午再专门来谈一谈关于模范大工厂的工人情况。

到了下一个星期天，包惠僧刚吃过午饭，项德隆就来到了。一见面，他就笑嘻嘻地对包惠僧说：您给我的书，我都看过了。接着，

①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② 《包惠僧回忆录》第38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